

心灵的格式化与符号的普遍理据性

谭光辉

摘要：完全任意性的符号不存在，每个符号的创制都有一个原因。符号的原初理据性是心灵的原初认知方式：像似性和相关性，后来卷入反向相关性。心灵按此方式创制符号，符号反作用于心灵，赋予心灵以格式，格式化的心灵又按相关性和反向相关性的原则创制新的符号，因此符号与心灵互为理据性。符号的理据性在新符号的创制和使用过程中磨损，导致原初理据性丧失，但是符号的心灵理据性却始终可以辨认。

关键词：语言符号；心灵；格式化；理据性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9-0171-08

作者简介：谭光辉，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8）

一、索绪尔与皮尔斯的共识

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索绪尔认为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①，以这一原则为基础建立了语言符号学，对语言学、文学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一原则是索绪尔对语言的基本判断，由其后继者将其扩散到所有符号系统（例如巴尔特）：任意性是符号之所以为符号的原因，任意性是符号学的第一原则。

几乎与索绪尔同时建立另一派符号学的皮尔斯的看法与索绪尔颇为不同。皮尔斯对符号有很繁琐的分类，其中根据符号与动态对象之间的关系，他把符号分为三类：像似符号、指示符号（一译标引符号）、规约符号（一译象征符号），前两种是有理据性的符号，第三种是无理据性的符号。皮尔斯与索绪尔并未互通意见，既未受对方影响，也未互相驳斥，但有一点是他们的共识：存在一种无理据性的，以任意性、强制性为原则的符号。

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之争，从柏拉图《克拉提鲁斯篇》开始，一直悬而未决，后来的思想家也从未得出过明确的结论，“他们重复二千四百年前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苦恼，没有人能坚持一个贯穿性原则”^②。随着符号学研究从语言符号研究向其他方向的突破，符号学家发现在非语言符号中，纯粹任意性符号倒是很少见。皮尔斯认为符号大多数是有理据性的，只有少数是例外，例如营火、军旗、证章、口令以及任何平常的词。后来的符号学家更愿意把精力放在论证符号的理据性之上，但是少有符号学家提出符号的普遍理据性的观点。符号是否具有普遍理据性遂

收稿日期：2013-06-01

① [瑞士]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02 页。

② 赵毅衡 《理据滑动：文学符号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文学评论》2011 年第 1 期。

成为一个问题，而语言的普遍理据性成为该问题中的难点。

西尼在《写作的理论》中提出，存在某种普遍之物，某种语词与思想的普遍形式。普遍之物让不同的内容（音响符号、书写符号、字母符号、图画，或者象形文字等）成为同一事物的不同符号，他把这种普遍之物叫作“逻辑形式”，逻辑形式是一种客观可察的心智内容。

赵毅衡在详细讨论了中西学各家对理据性与任意性的观点之后，提出了“普遍语用理据性”^①的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普遍语用理据性是语言艺术立足的基础。语言使用有两个功能：语言（符号）因反复使用成为象征从而使理据性上升；语言（符号）也会在不断使用的过程中使其理据性被磨损从而造成理据性下滑。除此之外，在特殊的语言安排中理据性可以滑落后陡升。赵毅衡的意思是语言的理据性是普遍存在的，其理据性存在于使用过程中，不论语言的原始理据性存在与否，使用既使原始理据性失落，又使其获得新的理据性。这样，赵毅衡就解决了皮尔斯所说的规约符号的理据性问题，从而证明了符号的普遍理据性的存在。本文的目的是从心灵理据性的角度重新分析该问题，从另一个侧面与赵毅衡的“普遍语用理据性”形成呼应。

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事实上并非指符号与意义的任意性，而是指语音任意性，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联的任意性，“索绪尔只不过是传统上摆在符号与事物之间的任意性转移到了声音与概念之间”^②。由于索绪尔并不关注符号（能指与所指的整体）与意义之间的关联，而是把问题转移到概念（所指）与声音（能指）之间的关系，而同一所指在不同的语言、方言中可以完全不同，所以他的结论就显得无可辩驳。任意性必然与武断性结合，即一旦一个任意的能指与所指结合为一个符号，它就是强制性的，无须论证的，语言因而极具情性。简单地概括地讲，语言是约定俗成的。索绪尔精通多国语言，在大量地考证了各地语言差异之后得出这个结论，自然是独到而精深的见解。但是我们的疑问也从“约定俗成”这一看似无可辩驳的现象开始：符号的任意性问题可否论证？“约定俗成”如何可能？“约定俗成”是否需要一种共同的心灵基础？

索绪尔对语言有一个比喻，语言就像一张纸，切分纸张，得到许多片断，每个片断都有正面和反面（意义），每个片段的切分方式都涉及与其相邻的片断（价值）。意义就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价值来自符号间的关系。按这种理解，语言系统形成之后，对声音的切分就已经固定下来，它不大可能再有改变。把语言符号看作任意的理论导致两种理论危险，一是如巴尔特由此推导出语言作为系统的任意性、意义生成的任意性乃至言语与现实无关的结论；二是从符号的强制性推导出语言暴政。孔帕尼翁认为，无论各种语言对一段彩虹色彩的切分方式如何不同，彩虹还是那段彩虹。具有同一个所指的符号不会因为能指的差异导致所指对象的改变。具有差异的能指，在所指的层面保持了同一。所以，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实际上是能指的任意性。

所谓任意，就是没有原因，因而不可论证。但是不可论证并不意味着一定没有原因。现代各类学科都不愿意将学科的原初理论建立在无因果论上，而是相反，因为人类理性的本性是逻辑，各门学科都是在追问现象（果）背后的本质（因），其基本思维模式是因果逻辑。作为人文学科重要工具的符号学，也始终坚持用科学的、逻辑的方式解决问题，致力于寻找符号现象背后的规律，高度关注符号背后的因果逻辑。所以，用任意性来说明我们不明白其产生理据的符号，并将其作为符号生产的重要（甚至唯一）方式的判断本身就是武断的。所以，对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的认真考察，是符号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

除汉语外，全世界大多数语言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对表音文字理据性的考察只能从语音入手，从语音入手考察其理据异常困难，因而符号学家选择放弃实乃明智之举。但是汉语不一样，一部《说文解字》就是汉字普遍理据性的最佳证明。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证明表音文字语言的普遍理据性。本文认为，表音文字语言的普遍理据性不可逐一论证，我们可以从语言符号的普遍

① 赵毅衡《理据滑动：文学符号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② [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

理据性入手，用演绎法论证之。

二、符号的定义问题

符号普遍理据性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一个更基础的问题的解决：什么是符号？只有弄清符号是什么，谈符号的理据性的问题才会明朗。本文在综合各家学说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个定义：符号就是可感知的心灵形式。这个定义规定了符号必须具有的三个基本要素，缺任何一个都不成符号。

第一，符号必须可感知。不可感知的不成符号。任何形象和色彩都不可能成为无视觉感知力的人之符号，任何声音都不可能成为无听觉感知力的人之符号。超声波、用红外颜料作的画、其他各种人类无法感知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成为人类的符号。符号必须可感知，可感知的都有条件成为符号，即便是梦、记忆中的表象，都可能成为符号。表象是感知的结果，但是可以在记忆中被翻阅，虽然无实体存在，仍然是可感知的，也有可能成为符号。

第二，符号是一种形式。这也是索绪尔以降的诸多符号学家的共识。卡勒对索绪尔的理解是准确的“要达到交流的目的，声音就必须是惯例系统的一部分，符号系统的一部分。符号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① 不存在无形式的符号。因为抽象的形式没有办法被感知，所以符号一般需要一个中介来附着。符号与其附着物（中介）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致很难把中介与符号分开。把中介与符号分开的方式是抽象和剥离。

第三，符号是心灵的形式。自然物也有形式，但是自然物不是符号，除非将心灵的形式附加其上，物的形式吻合了心灵的形式。我们感知到的任何符号只有吻合心灵的形式，才可以被心灵识别、理解和接受。索绪尔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坚持认为语言符号连接的是概念和音响形象，音响形象“不是物质的声音”，“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②。索绪尔关注了能指的心理本质性，也强调了所指的心理本质性，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是相当深刻的。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符号会是一种心理实体，难道声音与概念的任意结合就是符号产生的原因？这种结合本身有无心理依据？

这个关于符号的定义来源于赵毅衡对符号的定义和我对该定义的重新理解。赵毅衡的定义是：符号就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而接收的感知”^③。本文的理解是：心灵形式就是意义，只有具有共同的心灵形式，理解才可能。符号是对中介上附着的心灵形式的抽象。符号不是中介，中介是符号的载体。认为符号是一种中介的主要错误在于未能从符号与中介的混合物中剥离中介，混淆了中介与符号本身。区别符号与中介最简单的办法是替代法，中介是可替代的，而符号是不可替代的。只要能够找到任何一个与其不同的东西替换而不影响其意义接收，这个东西就是中介，而不是符号。例如一个汉字“树”，“树”可以用各种字体写成，也可以用拼音表示，还可以用速记法中的各种符号表示，声音可以变化（底限是可以被辨认），懂汉语的人都可以知道它的意义。所以，“树”这个汉字就是中介，其意义在心灵中的形式却不可替代，“树”这个符号的意义在汉语中只有一个，这个符号却可以通过多种中介被感知，可以通过声音中介，也可以通过文字中介，还可以通过代码中介。中介不是唯一的，而符号的特性在于它的唯一性。符号之所以是唯一的，因为它是心灵中某种唯一形式的显现。

从这个定义出发，任何符号的创造都不可能脱离心灵的形式。既然不能脱离心灵的形式，符号的创造就不可能没有心灵的理据。这个问题的解决又要依赖于另一问题的解决：心灵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心灵的形式是如何形成的？

① [美] 卡勒 《索绪尔》，昆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 页。

② [瑞士]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01 页。

③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7 页。

三、心灵的格式化与符号的普遍理据性

心灵格式化问题的最早提出者是拉康。拉康认为无意识是“按一种语言方式组成的”(the unconscious is structured like a language^①)，赵毅衡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无意识是“按符号方式格式化的”^②。这个判断极为重要，他们虽然讨论的是无意识的组织方式，但我认为这个论断可以扩展到整个心灵，包括无意识也包括显意识，人的自我只能是以符号化的方式组成的，人的自我是符号自我，人的心灵是符号化的心灵。心灵创造了符号，符号又格式化了心灵，二者互为理据，循环往复，实现意义的创造与解释的过程。即使如此，这二者谁先创造谁总得有个次序。

索绪尔认为，语言出现之前思想是一片混沌，语言是从混沌状的声音中选择一部分，又从混沌状的思想中选择一部分，然后把两个部分连接到一起，而这个连接是任意的。这一认识是任意性原则产生的基本原因。问题是假若声音与思想起初皆为混沌，那么秩序如何获得？思想与声音谁先获得秩序？即使起初都不存在秩序，人又如何在混沌的声音和混沌的思想之间建立连接？

海曼(John Haiman)在《自然句法——像似性与磨损》一书中努力证明，语言结构如同非语言的图示，都以像似性为基本原则，像似性大量存在于语言之中。第一是同构原则，即形式的相像反映了意义的相似；第二是动因相似，即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本质方面的图示。像似性用于描述“表层语言形式和底层语言形式之间的相似性”，经济性(无标记性)是它的竞争者但并非唯一竞争者。这些竞争者导致像似性的磨损“随着(语言或艺术)组块的磨损，它们可能丧失与所曾描绘事物的相似性。”^③海曼通过大量的语言实证说明，“每种人造的或非像似的系统都建立在早先像似的系统之上”，然而相似性的不断再产生导致语言从生来像似变成如今到处都是约定俗成。海曼在中文版前言中介绍说，如果要是现在(2009)重写这本作于1985年的书，他将把像似性整合进一种更为概括的解释，这种解释认为语言总体上更像绘画艺术。《自然句法》的意义在于它解释了语言并非无缘无故的任意，所有语言都是由原初的像似发展而来，只不过像似性的磨损导致人们误认为语言符号毫无理据而已。

那么，为什么人会以像似性作为构建语言的首要原则呢？海曼并没有给出一个解释，但是他认为有一种观点难以得到合理解释：像似记号比任意记号更容易学习和记忆。他认为儿童语言习得和手势语习得的研究材料证明此结论错误。记号在人脑中的储存与恢复，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同其他记号之间的形式关系，即索绪尔所说的“价值”，德里达所谓的“差异”。另一种基于推测的观点认为语言同艺术一样，动因是纯审美的，像似性的动因只不过是人类喜欢“依葫芦画瓢”而已。这两种结论都源于推测，因找不到普遍的证据只能停留在猜想的层面。不过，通过语言相似性原则讨论普遍理据性的工作正在国际符号学界展开，阿姆斯特丹大学组织了两届“语言像似会议”，集中讨论此问题。诺特认为语音、词法、句法、词源都有各种各样的理据性，是“模仿形式的形式”，他将此称为“内理据”，他称“模仿意义的形式”为“外理据”，内理据是个别的，外理据是普遍的，是“普遍语言像似”^④。普遍语言像似性问题揭示的核心问题，是符号表意的基本原则是否是“模仿”。

像似性原则对任意性原则提出了挑战，但证据毕竟太过有限，无法解释符号的普遍理据性问题。不过，海曼的观点却有强烈的启示意义。第一，像似原则首先赋予“意义”以秩序。秩序首先存在于“意义”处，语言为了求得与“意义”的像似才因此获得秩序。第二，像似导致最初的能指分节，最初的能指分节决定系统的最终走向。固然，能指分节的差异可以导致所指分节差异，但这仅仅是后来的能指分节对心灵塑造作用的结果。第三，像似性磨损是解释符号理据性

① Jacques Lacan, *Ecrits A Selection*, London: Tavistock, 1966, vol 1, p. 166.

②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页。

③ [美]海曼(John Haiman):《自然句法——像似性与磨损》，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8—20页。

④ 参见赵毅衡《理据滑动：文学符号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下滑的有效方式。经济性原则可以看作符号规约过程中的一条原则,几乎所有符号的理据性都在规约过程中下滑或丧失,规约就是像似性磨损、理据性下滑的主要原因。

海曼的理论需要涉及心灵的基本工作方式,可惜他在这个方面没有深论。

按最近关于心灵发生的基础机制研究成果的观点,心灵是物质与信息微观作用的结果。从微观的角度看,心灵的物质基础是大脑与中枢神经,其发生机制是神经元的相互作用。从宏观的角度看,心灵是人与环境频繁相互作用的结果。总之,心灵的基本运作机制是大脑与外界物质不断进行信息交换的结果。构成物质的粒子的活动形成物质场,物质场同时也是信息场,信息场是一物向他物转化时发生的现象,既显示物质自身的规定性,又表征某物在他物中的间接存在,这就是“自在信息”。当自在信息被主观直接把握或显示,就成为“自为信息”,自为信息是人脑对外界信息的同化,包括感知和有感记忆。自在信息被人的感受系统接收,在大脑皮质中形成感觉,在认知结构参与下,大脑对其进行加工综合形成知觉。认知结构来自遗传和后天与环境交换信息形成的经验。感知以信息的形式存储于大脑中,称为有感记忆。感知与有感记忆再经过思维程序主动创造信息,产生的概象信息和符号信息,称为“再生信息”。拥有生产再生信息的能力被认为是拥有完整心灵的标志。其中,符号信息是为了交流需要把自为、概象信息以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方式予以表征的结果。再生信息必须依赖两个信息来源:记忆信息和凝结成主体认知结构的信息,这两种信息既是信源又是信宿,在参与生产再生信息的整个过程中,所有参与的因素与信息加工都是相互作用的,信息循环无所不在。心灵与物质不过是一体两面,心灵的本质既是物质的,又是信息的,心物从来就没有须臾分离^①。

按照这个观点,符号是心灵创造的再生信息,是一种通过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方式对感知、记忆等自为信息进行表征的结果,所以符号就是一种心灵的格式。另一方面,心灵在生产以符号信息为代表的再生信息的时候,心灵与信息是相互作用的。即是说,心灵生产符号,符号同时又反作用于心灵,赋予心灵以格式。心灵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是循环、相互作用的关系,而非谁产生谁的关系。尽管如此,符号信息的产生仍然需要更基础的信息为“素材”,信息加工离不开感知与记忆,而感知与记忆又离不开物质场的自在信息。同时,作为物质存在的大脑、神经元也是一个物质场,也有自为信息。那么,心灵就是在两个物质场相互交换信息的关系中产生的结果。这样讨论的结果最终使我们陷入物质主义而不能自拔,以致我们必须相信人的大脑有某种特殊的机能,使其不同于一般的物质,这种机能就是感知与再生产感知的能力。

因此,无论现代科学如何进步,我们仍然必须回到对心灵宏观层面的讨论之中,必须回到非物质的层面。瑞恰慈等人认为心灵就是大脑认知能力之综合,还有很多人认为心灵是认知的“自觉”或“自觉的自觉”,“自觉”就是反思,心灵就是一种反思和对反思进行再反思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大脑的综合认知能力的表现形态。心灵是人脑的一种机能的显现,这种机能的主要特征是可以对感知信息进行加工、反思、创造。心灵的形成是与感知信息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创造信息,同时又被所创造的信息赋予格式。

现在让我们回到起初的问题,索绪尔所说的思想与声音谁先获得秩序?思想与声音(符号)如何建立连接?首先必须先有一个概念的替换,不然问题说不清楚。所谓思想,就是概念,就是“概象信息”。所谓声音,就是一个可感知的信息。概象信息是已经经过大脑处理后的感知,它存在于心灵之中,可感知而不可传递。声音是一个可感知信息,既可感知又可传递。思想需要交流,就必须借助可感知的声音予以替代。那么,声意替代概念时是任意的还是有规则的?

假如声音替代概念时遵循任意性原则,必然会出现如下问题:第一,完全任意必然失去秩序,从而无法组建系统;第二,完全任意必然导致重复,不能形成靠差异而存在的符号;第三,完全任意必然导致接收的困难,心灵感知信息的对位关系会遭至破坏。“诺特指出,有三种压力

① 参见邬焜等《社会信息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3—71页。

使语言出现像似性: 第一, 接收者的思想与认知中, 出现心像; 第二, 在“创作性文本”中必然需要像似性; 第三, 双方的传达, 以互相理解对方为先决条件。”^① 诺特将心灵因素与传达、接收双方相互理解对方意图纳入考虑范围, 从而否定了任意性原则。

所以, 在某种心灵格式中存在的符号, 一定不是任意的, 任何符号的产生都有一个原因。任何一个符号首先必须具有系统理据性, 必须考虑与整个系统的关系, 必须考虑这个符号与别的符号的非重复, 该符号在聚合轴上与其他符号必须有区别, 在组合轴与其他符号可搭配。索绪尔也不得不承认, 能指的首要原则是区分性, 差异才能产生意义, “任何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区别得很清楚的音位”^②。其次必须考虑这个符号是否适于被处于相同语境中的人接受, 是否适合沟通。第三必须考虑该符号是否可操作, 一个发音是否适合该群体的发音习惯等。在这些约束之下, 一个声音不可能做到完全任意。在绘画和书法中, 失去理据性的符号叫做“败笔”; 在音乐中, 不符合心灵理据性的音符叫做噪音; 在文学作品中, 没有理据性的语言不可被理解; 在语言系统中, 没有理据性的符号不能被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 社会规约本身就是一种理据性, 符号必须吻合群体的心灵, 才能被接受从而完成规约过程。

任何符号都是由个体创制的。任何个体符号都会按一定的理据创造, 但是创造出来之后它必须经过一个社会规约的程序才会变成系统中的一部分。所以, 个体在创制符号时对社群规约的种种考虑即是创制符号的理据。即使创制像似符号、指示符号也必须有一个规约的过程才能进入系统, 必须有社会规约的理据。因此, 就个体符号而言, 理据性是普遍的; 就符号系统而言, 规约性是普遍的。同时, 如赵毅衡所言, 社会性使用, 使意义累加, “使用给符号以意义, 使用本身就是意义”^③。社会性使用, 与社会规约一样, 都是符号的理据。因此, 理据性是个体符号、社群符号的普遍性质。

索绪尔承认语言的部分理据性, 例如拟声词、感叹词和复合词; 乌尔曼提出拟声、衍生词、修辞三种理据; 热奈特承认诗歌语言创造尽量多的有理据的词语; 费歇认为语法是“图表像似”; 乌尔曼最终认为任意性和理据性都是普遍的^④。至此, 理据性逐渐取代任意性而将成为符号学的第一原则。

就个体创制符号而言, 符号化就是抽象化和形式化, 符号在个体心灵中表现为一种“心像”, 在心灵中占据一个位置。个体心像要与他者心像沟通, 必须合并为类型, 所以埃科认为, 符号是类型^⑤。上文说过, 符号是在心灵格式中不可替代的感知形式, 然而却可以通过不同中介来表达, 在系统中, 中介表达一种感知类型, 感知类型因所指的相对固定而不能任意。又因符号是唯一的, 所以符号就没有任意性, 正是因为没有任意性, 符号系统的表意才可能做到准确。这正如符号的规约性的作用“规约性是符号必定要有的品质, 不然无法保证符号表意的准确。”^⑥

符号系统一旦通过社会规约的方式得以建立, 它就具有强大的格式化功能, 它将无所不在地影响心灵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乔姆斯基说, “从深层和重要的意义上来说, 语言是人脑的一面镜子”^⑦。他的意思是说, 人脑与心灵的形态可以从语言的形态中窥视, 语言的格式就是心灵的格式, 因为心灵就是用语言格式化而成。人的梦呓是最具任意性的语言之一, 但是说中文的人的梦呓仍然“是”或者“像”中文, 他不可能说出一种新语言, 这就是语言对心灵格式化结果的显现。索绪尔发现语言相对于其他社会体制而言最具惰性, 最不适宜于创新^⑧, 也是这个原因。维柯认为, “人不是什么先决条件, 而是制度建立过程的结果、效果、产物”^⑨。即是说, 人类创造

①③④⑥ 赵毅衡 《理据滑动: 文学符号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文学评论》2011 年第 1 期。

②⑧ [瑞士] 索绪尔 《普能语言学教程》, 高名凯译,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第 62、110—111 页。

⑤ [意大利] 翁贝托·埃科 《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王天青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36 页。

⑦ [美] 诺姆·乔姆斯基 《关于认知能力》, 载 [英] 查尔斯·哈里森 《现代主义·评论·现实主义》, 崔诚、米永亮等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3 页。

⑨ [英] 霍克斯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瞿铁鹏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4 页。

了符号，符号反过来又创造了人类，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所以，在一个系统中，任何新的符号的创制，都必然按照系统的区分格式创制，不可能超越系统，不然无法被辨识。因此，即使高度抽象化的符号创造，仍然是在心灵格式中完成的，不可能完全任意。至此，符号的普遍理据性又得一论据：心灵与符号互为理据。

再换一个角度，若任意性是语言的基本原则，那么就可以用任意性原则创造一种新语言并使人轻易掌握，事实证明这非常困难。假若有人愿意新造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必须比任何语言都拥有更强的理据性，例如由波兰医生柴门霍夫 1887 年创造的世界语，每一个词根都有来源，各种构词语、语法规则都不可能做到任意，他实际上是按更严密的逻辑、思维方式来创造语言的。李娟红通过研究笔记小说发现所有所谓“新词”都有理据；曾丹发现网络新语的生成方式或是隐喻，或是转喻。蒋绍愚发现所有派生词都有理据，张永言发现除原始名称外，语言中的词大多都有理据可说^①。这些研究无一例外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大量的新词（在一个语言系统中创造的新词）都可以找到之所以被如此创造的原因。即使大量新符号组建成一个新的系统，这个系统也不可能做到无缘无故。

四、心灵理据与个体符号的创制

综上所述，无论是个体符号，还是已经规约的系统符号，都按一定的心灵理据创制，在使用过程中原理据被磨损，同时积累意义产生新的语用理据性。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所有符号都首先由个体创造，由群体规约，那么个体在创造符号的时候的理据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几乎所有符号最初都是通过模仿的方式创造，基本理据原则是像似。绘画训练基本上都从写生开始，音乐从模仿开始，所有文字最开始都是象形^②。几乎所有语言对母亲的称呼都是 mama，可能源于模仿婴儿依靠本能发出的第一个声音。在语言、艺术的起源论中，摹仿说始终具有说服力，因为其他起源论（例如游戏论、劳动论、巫术论、宗教论等）都是目的论或原因论，只有摹仿论才是方法论，唯有摹仿论能够解释符号的最初形态如何取得。摹仿论在 18 世纪之前一直都保持了权威性，但是到狄德罗、莱辛、施莱格尔、谢林的时代，模仿论受到质疑与挑战，因为严格执行摹仿论原则“会导致荒谬的结论”，艺术将因此而失去意义，另一方面，艺术在自然界中“找不到任何的对应物”，“艺术不应摹仿自然，而要告诉我们如何判断自然美的标准”^③。这个质疑是有道理的，因为任何符号的创制，一旦离开最初的像似理据，就必然依据心灵的格式与美和善的原则进行创造，康德认为，美是合目的的形式，所谓目的，就是指心灵的格式。任何心灵的创造物，都不可能超越心理可能。正如对虚构叙述的理解，“我们面对虚构叙述的叙述者，从各式各样的三界通达方式中选择了一种来构筑文本，他的选择就必然卷入因果和伦理。用可能世界理论解释虚构，结论必然是虚构情节包含着逻辑理由”^④。所以，任何艺术、符号的创造，也必然在心灵的层面卷入因果与逻辑，没有无缘无故的个体符号创造，即使是荒诞、不可能符号的创造也是如此。

但是，艺术符号总是要突破常规，违反常规理据。第一种极端的尝试是涂鸦。涂鸦的结果有两个：一是涂鸦毫无意义可言，其结果是它根本就不可能被视为符号；二是心理分析学家从涂鸦中发现了意义，他们发现了涂鸦者潜意识中的秘密，潜意识就是理据，加宁、福克斯认为“涂鸦日记比语言表达的东西更加深入”^⑤，涂鸦的意义就是它的理据。另一种尝试是超现实主义者的所谓自动写作，通过各种方式使人进入潜意识状态，这种尝试的结果与涂鸦相同。第三种方式

① 赵毅衡《理据滑动：文学符号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文学评论》2011 年第 1 期。

②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8 页。

③ [法] 茨维坦·托多罗夫《象征理论》，王国卿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94—195 页。

④ 赵毅衡《三界通达：用可能世界理论解释虚构与现实的关系》，《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2 期。

⑤ [美] 加宁、福克斯《涂鸦日记“倾听”你的心灵》，谭晨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 页。

是用抓阄创作诗歌，然而这种创作方式仍然需要作诗者按一定的要求把抓出来的词语组合、拼接成有意义的句子，不然诗歌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词语。这种作诗法确实可以使诗歌的理据性降到最低。然而若读诗者不能从诗中发现意义，尝试就只能宣告失败，其理据性要由读者赋予。纯粹任意符号不可识别，理据性或者来自符号发送者，或者来自符号接收者，二者必居其一。

理据有多种，不一定非得依赖像似。修辞是像似的各种变体^①，是产生符号的重要途径。从理论上讲，有多少种修辞格，就有多少种创制符号的方式。埃科曾提出十种创制符号的方式：痕迹或印迹；征兆；迹象；样例、样品、假样品；载体；风格化的东西；组合的单位；假组合的单位；程序化的刺激；创意^②。仔细检查，会发现这十种创制符号的方式都可化成提喻、转喻或隐喻，本质上是变体的像似符号。但是，因为像似的变体卷入“相关性”元素，就使多种符号创制方式的像似性不可辨认。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涉及语言符号和艺术符号创造，埃科的十种符号创制方式就远远不能涵盖全域。符号的创制可以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只要能够在两个事物之间建立相关性，都可用埃科“一物代一物”的定义来定义其中一物为另一物的符号。前文说过，符号只是一种心灵形式，像似和相关性原则只是说明某物在心灵中留下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可以唤醒心灵对另一物的相关感知和记忆。一般符号的辨识依赖经验，语言符号的辨识信赖格式，因为后来人类的语言习得方式已经使人不再可能回到原初的语言习得状态之中，人类也不再可能回到具有原初理据性的语言环境之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语言因为理据性过于复杂纷乱和无数次卷入相关性而不再可以辨认。

五、结 论

语言与符号对心灵具有强大的格式化功能，导致心灵总是按照语言与符号的格式认识和表达意义。心灵的理据性变成语言与符号之后，就导致语言与符号的理据性不再清晰，因为人类不愿把结果看成原因。本研究的结论恰恰相反，心灵与语言符号互为理据，且心灵认知形式是语言与符号的原初理据。符号系统的基本理据是心灵的原初认知方式，像似与相关性是心灵感知的基本方式，反向相关性（反讽）的卷入使心灵认知方式变得异常复杂，原初理据性便在语言符号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磨损。磨损后的语言符号会多次卷入其他相关性，使语言符号的原初理据性彻底丧失。语言符号的格式化功能又导致心灵的格式发生改变，人类也因而变成与初民不一样的人类。语言符号由人类创造，又反过来改造了人类自身。

（责任编辑：李亦婷）

The Formatted Mind and the Universal Motivation of Signs

Tan Guanghui

Abstract: Completely arbitrary signs don't exist. Every sign has a reason of creation. The original motivation of signs is the original cognitional style of mind: iconicity, correlation, afterwards, reverse correlation. Mind creates signs in the above styles, signs react to mind and format it. Then, the formatted mind creates new signs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correlation and reverse correlation. Therefore, signs and mind have mutual motivation. The motivation is eroded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and use. It results in the loss of original motivation, but the motivation of mind can always be recognized.

Keywords: Language Signs; Mind; Formatting; Motivation

① 赵毅衡 “很多人认为所有修辞格实为比喻的各种变体，因此修辞学就是广义的比喻研究。”载《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8 页。

② [意大利] 翁贝尔托·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青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4—60 页。